

同济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研究

姓名：赵智展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公共管理

指导教师：周箴

20060301

摘要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随着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其政治地位正日益提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自身成长面临的许多问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加强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本研究以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领导学、组织行为学等理论为指导，采用了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的人生价值观等问题的调查，分析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产生、特征和发展趋势，探讨了温州在探索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和存在问题，同时根据党的统战工作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要求，以现代企业家必备素质为目标，针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建立健全领导协调、培训教育、考核评价、激励约束等多种机制、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成长的政策、法律、舆论和市场环境、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对策与建议。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有关问题的研究，引起党委、政府和社会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问题的重视，进一步明确培养意义和培养方向，为更好地完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建立适合温州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关键词：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领导素质，人才成长

ABSTRACT

As a new social stratum and an important force of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are playing a more obvious role in social life, with their economic power increasing and political status improv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blems that the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are facing during their growing up are arousing wide attention among the public, thus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has become an urgent strategic task.

This thesis is writte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arty's general and specific policies for the United Front Work and theories on Leadership Science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using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questionnaire. Through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basic information and views on some important questions, the thesis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emerging,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in Wenzhou, and makes a study of both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and the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in Wenzhou's training practice. Finall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training, aiming at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the modern entrepreneurs, it gives such suggestions as establishing multi-mechanism of coordinating, educating, evaluating and encouraging; creating favorable environment of policy, law, public opinion and market;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NGO etc.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make it known to the Party's commission and the government of various levels as well as the whole society the urgency of training the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and suggest a direction for the train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work of training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and setting up a training mechanism which is complied with Wenzhou'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ituation.

Key Words: Non-public Economic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Training, Leaders' Quality, Talents' Development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人完全了解同济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如下各项内容：按照学校要求提交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的印刷本和电子版，并采用影印、缩印、扫描、数字化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学校有权提供目录检索以及提供本学位论文全文或者部分的阅览服务；学校有权按有关规定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者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前提下，学校可以适当复制论文的部分或全部内容用于学术活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赵智康

2006 年 5 月 10 日

经指导教师同意，本学位论文属于保密，在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指导教师签名：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赵智康
年 月 日		2006 年 5 月 10 日	

同济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签名：赵智辰

2006年5月10日

第1章 导论

1.1 研究意义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是由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从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目前的33%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70%以上是由非公有制经济提供的,从农村转移出劳动力的70%以上也在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就业。实践证明,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与非公有制经济一起成长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他们既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非公有制经济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实践者,他们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比重的进一步加大、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作用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广泛的认同。而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自身成长却面临很多问题,诸如综合素质较低、管理理念比较落后、法制意识淡薄、创新能力不够、缺乏战略思维和眼光等,不能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带来的压力和挑战,非公有制企业家发生问题甚至违法犯罪事件也时有所闻,引起社会和公众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引导培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

温州是全国市场发育最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其非公有制企业数占到工业企业总数的99%,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也量大面广。因此,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和成长,一方面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包括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多的

市场机遇,但另一方面,更需要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提高内在素质和能力,这除了通过他们自身努力外,还需要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重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工作,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成长规律的探索,进一步完善培养的有关机制和措施,创造有利条件,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使他们成长为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由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产物,它既属人力资源培养范畴,又属意识形态培育范畴,是我们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对此国际上无现成理论和经验可以参考。同时由于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起步不久,目前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尚处于探索阶段。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目前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如思想认识方面,一直以来人们偏重于对非公经济的扶持而忽视了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致使培养工作明显滞后于非公经济的发展;培养内容和手段方面,多年来沿用一成不变的模式,以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主要内容,培养目标不明确,重点不突出,手段也缺乏创新,致使培养效果不如人意;加上培养工作机制不完善,各部门各行其是,资源分散,没有形成合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学习意识不强等,给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快速成长带来了较大的障碍。因此,探索有利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科学合理、稳定有效的多种培养机制,营造公平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快培养和建设一支蓬勃向上、富有社会责任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的高素质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是适应温州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2 研究内容、方法与目的

1.2.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第二章对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相关的一些理论进行了综述。党的统一战线关于开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理论指出,开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培养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健康成长;企业家的领导素质论阐述了领导素质所具有的几个特性以及包含的五个方面内容,是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目标和方向;企业家成长的一般规律认为企业家的成长与其他专业类型人才的成长相比既有共同的规律性,又具有特殊规律,培养工作必须遵循这些规律而开展;组织行为学关于企业家激励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激励要以满足其合理需要为前提,而这一合理的需求又是多样化的,激励也是培养的一种重要手段。

上述理论是我们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基础和依据。

在第三章中,笔者主要对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产生、特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产物,经济体制改革是其产生的根本动力。在论及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特征时,认为其既有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一般特点,更带有浓郁的温州地域文化特色,其内部结构、行为心理都明显打上“温州模式”的烙印。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数量的增长和分化重组、变化发展,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更值得深入研究,是我们对其培养时必须关注的因素。

本文的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温州在探索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方面的一些成功做法和存在问题,并阐述了加强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温州由于非公经济发展较快、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较早,它从自身需要出发探索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实效性,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这些问题也往往带有普遍性。新形势下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第五章是本文的重点部分。笔者在前几章分析的基础上,尤其是针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素质缺陷以及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运用有关理论和相关知识,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和思考,提出了进一步改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若干对策建议。

在第六章中,笔者总结前几章的研究结果,得出了本论文的总结性结论。

1.2.2 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了理论分析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人生价值、参政议政、诚信经营等一些问题的调查,深入分析了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特征和发展趋势,探讨了温州在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中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运用党的统一战线理论、领导科学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政治参与理论、非政府组织理论等相关理论和知识,针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如何进一步完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思路与建议。

1.2.3 研究目的

笔者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能引起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问题的重视。通过对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特征趋势的分析和存在问题的

研究,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设性思路,能对温州做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提供借鉴,从而为进一步完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建立适合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指导作用。

1.3 课题研究对象和概念的界定

本文研究对象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亦即有代表性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里涉及到三个概念,一是非公有制经济,二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三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本文所言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指个体、私营经济。个体经济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经济,它的基本特征是以经营者本人或者家庭成员劳动为主,由个人支配其劳动所得的一种经济形式。私营经济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经济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雇工为主,并占有剩余价值。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最早形成的非公有制企业主,主要是来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和废除人民公社以后被解放出来的农民和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无业人员;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商品经济大潮涌动,旧体制开始松动,公有制单位包括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成员才开始大规模“下海”,加入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创业者队伍中来,促进了第二代非公有制企业主群体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社会多样化趋势日益明显,人们的就业观念日益改变,一些高级专业人才加入到自我创业的队伍中去,构成了第三代非公有制企业主群体的骨干。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概念,中央统战部有文件指出:一般是指“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投资者”¹。十六大报告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们的阶层属性作了明确:“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可见,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得到了确认。

¹ 《中共中央批转统战部〈关于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1]15号),1991年7月6日

从其构成主体的演变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已经由过去的主要以农民和城镇待业人员为主,发展到包括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分流出来的行政干部和中高级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以及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等在内的庞大队伍。当前,这支队伍仍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群体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利益要求、政治愿望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别于一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原工商业者。个体素质参差不齐是这一群体最为显著的特点。此外,非公有制企业主阶层还体现出以下具体特征:一是社会身份的多重性,二是劳资矛盾的非对抗性,三是个人收入使用的有限性,四是政治态度的求同性,五是政治行为的非自觉性,六是精神世界的矛盾性。²从总体和本质上看,他们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成员。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壮大起来,他们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代表人物。对于这些代表人物,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经常采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或者有代表性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这样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一概念一直缺乏统一的权威的解释,也鲜见学者给出完整的概念表述。有的倾向于经济实力决定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路路认为,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有机会参与政治系统活动的人只是少数,他们基本上属于企业规模较大、社会资源较多和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主。安东尼·奥罗姆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一个人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两者之间有着令人信服的和十分明显的相关性。³而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声望起决定作用,“收入地位与政治参与的相关度最小……私营企业主政治安排的最关联因素,不是经济实力,而是非经济因素——社会名声。社会名声与政治相关度最大,反映出两者在现实生活中互涨的关系:社会名声越大,参与政治生活的可能性越大;反过来,政治参与度越大,社会名声往往也越高。”⁴也有研究者认为,尽管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声望为其“政治安排”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究其根本,“政治安排”源于私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如果私营企业主因为自身经济发展而获得政治安排,那他们就有理由通过利益表达进一步强化经济实力,而忽略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如果私营企业主仅是自身经济发展而没有强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会减少政治

² 胡林辉,《私营企业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 P209-212

³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P286

⁴ 陈光金,《私营企业主的社会来源、阶层意识与政治—社会参与分析》(R)。张厚义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6, 37-38.

安排的机会。因此,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安排,表达利益的对象不是私营经济实力,而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⁵

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笔者更倾向于综合经济实力、社会声望、个体素质、政治取向等因素进行界定这一概念。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不仅自身应当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同时也承担着“带动和影响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这支队伍健康发展”的历史重任,片面地强调经济实力或者社会声望是不够的。笔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指非公经济人士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行业威信和社会声望,爱国、敬业、守法,⁶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成长为代表人士的却仍为数不多。

另需说明的是,广义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既包括非公有制企业主,也包括其他领域和行业的个体或私营从业者,诸如一些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如律师等。但本文所研究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是个狭义的概念,仅指非公有制企业主,更具体一点,是指私营企业主(企业家),在文中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谈及阶层概念时,由于没有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阶层一说,故引用了私营企业主阶层和非公有制企业主阶层的说法。文中引用的有关调查数据,部分来源于温州学者戴海东所作的问卷调查。

⁵ 陶庆,《嬗变、缺位和弥补:政治安排中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皖南宜城市的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

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指出:“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爱国、敬业、守法,培养和建立一支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

第2章 相关理论综述

2.1 党的统一战线关于开展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理论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人格化的非公有制企业主阶层,也将长期存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以经营企业为事业,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党和政府的政策目标也是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双方之间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目标。因此,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引导和思想工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近年来,中央明确了开展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统战工作的要求,通过统战工作,培养一支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分子队伍,进而通过他们去带动和影响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引导这支队伍健康发展,对于发展壮大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团结、帮助、引导、教育”是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工作的基本方针;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是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工作的着眼点,健康成长的基本标志和基本要求是,在党的领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做到爱国、敬业、守法,具体标准则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结合”要求,即要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要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要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选拔和培养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是党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工作的基本方法和途径。只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了,才能使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在统一战线领域具有特定的含义,是上述“团结、帮助、引导、教育”方针的综合化。具体来说,就是指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些人力资源(人才)进行开发和管理等的过程。包括发现、选拔、举荐人才及对人才进行引导、教育、培训、激励等,使他们的素质与技能得以提高,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还包括对人才进行考核、评价、监督、约束以及为人才的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等。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就是通过对其中的某些政治上先进、经济上典型、形象上良好的代表人士安排一定的政治待遇或角色,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政治代表的作用,并通过他们带动所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坚定地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和信念。邓小平说过:“要发挥

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⁷从全国范围来看，政治安排大致分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是荣誉性的政治安排，即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组织安排一定职务，以便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制订和社会管理；另一种是实职安排，即在各级政府部门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安排适当的职务和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长，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2.2 企业家的领导素质论

企业家的素质是指一个企业家必须具备的各种条件在质量上的综合平衡。非公有制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经济组织，非公企业家又是企业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企业家的本质是创造。企业家在组织着产品的创新、市场的创新、原材料的创新生产方式、组织制度的创新。作为企业管理的主体，企业家的领导责任：第一是取得合理的经济效益；第二是使工具具有生产性并使职工有成就感；第三是承担企业的社会影响和社会责任。领导素质是领导者权威增损的主要力量，是决定领导者能否很好地履行领导职责的内在因素。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综合性：由于领导活动涉及决策、组织、协调、控制、用人、沟通等诸要素，多方面的复杂过程，因而对领导素质的要求也必然是全面综合的。

阶级性：领导者总是处于特定环境之中的领导者，他总是归属于某一阶级的领导者，超阶级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

层次性：任何社会都有其严密的组织结构，在组织结构中都包含着不同层级的领导职位，不同领导职位对一领导者的素质要求是不同的，对领导素质的要求是有层次的。

动态性：领导者总是具体的某一时代的领导者。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对领导素质要求在内容和深度上也会发生变化。

领导素质是一个动态体系。没有天生的领导者，也没有一成不变即可终生受益的领导能力。领导素质有着极其广泛的内涵，其具体内容则包括德行素质、管理素质、创新素质、知识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方面。其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见图2.1)

⁷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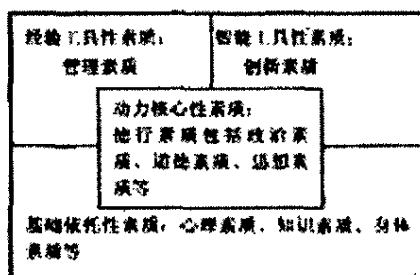


图 2.1 领导素质基本结构

a. 德行素质

德行素质是相对于人的道德品行而言的，在有效地组织、指导和激励企业职工过程中，德行素质具有关键性影响作用。有威信的企业家往往是那些有良好品行和道德的企业家。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回顾自己一生的经营管理实践时曾感慨道：一位经营者，不一定是万能的，但却是一位品格高尚的人，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使员工受感召而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企业家的德行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等。

b. 管理素质

管理素质是领导者的基础素质在领导职能中的综合体现，是完成领导职能的特定能力，它包括科学决策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把握全局能力、选才用人能力等，是开展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提高领导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c. 创新素质

波士顿顾问公司安东尼·W. 迈尔斯的论断：“对于成功的企业家，即那些不仅创造了企业，而且还引领着它成功地克服了成长过程中各种艰难险阻的企业家，我们总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与众不同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与他们充满活力的特点相比，一流企业家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创造性。”

d. 知识素质

知识素质是构成领导决策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素质的重要性对领导者来说就更加突出了，领导者知识素质决定着领导者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又决定着行为方式。只有具备了广博的知识，领导者才能具备和提高自己分析、判断、组织、决策等诸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知识素质又是领导者魅力的基础之一。

e.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主要表现为敢于决断的气质、竞争开放的性格、坚韧不拔的意志等。所有领导素质都需要有健康、优良的心理素质来支撑，并以心理素质为基本工具来认识、掌握、改变和发展自我。因而可以说，心理素质是所有领导素质的

心理平台。

2.3 组织行为学关于企业家激励的理论

传统的激励理论主要是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的,激励被认为是通过高水平的努力来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这种努力以能够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为条件。因此,管理激励理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的心理需求和动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激励理论,包括默里的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激励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阿德佛的 ERG 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另一类是以人的心理过程和行为过程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激励过程理论,包括弗洛姆的期望理论、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罗斯的归因理论和轨迹控制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激励过程理论体系较之激励内容理论体系从系统性和动态性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巨大进步,但从根本上来说仍以对人的心理特征和以此为基础的行为特征为出发点。图 2.2 反映了西方组织行为激励理论的四种类型,它们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激励的本质原因与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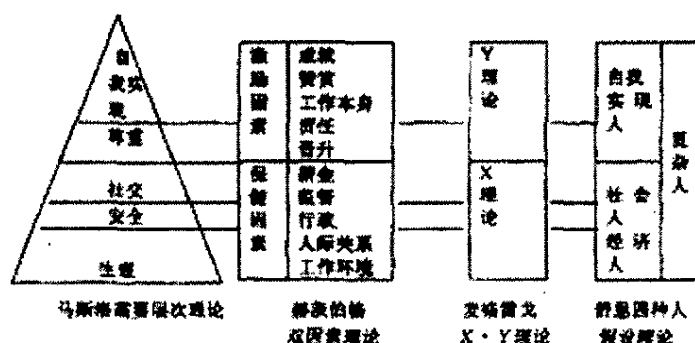


图 2.2 组织行为学关于激励的四个理论之比较图

从组织行为学来研究企业家激励的重要学者包括威纳和鲁宾(1969)以及佩顿(1980)等。他们主要从企业家动机与需要的假设出发,遵循的是传统的组织行为学研究方法。他们认为企业家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设计,要以满足企业家合理需要为前提,对企业家需要的满足可以驱使(诱导、激励)企业家朝向企业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因此,研究和开发企业家的动机,是公司成功的决定因素。威纳和鲁宾(1969),在麦克利兰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家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归属需要不同的行为表现形式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成就需要主要考虑的是决定非人际关系的、将导致公司高绩效的行为。而权力需要和归属需要则作为管理风格的决定因素,具有很大的意义。

美国企业家激励和报酬问题方面的杰出专家佩顿(Arch Patton),提出了一些对企业家特别重要的激励因素:(1)工作的挑战性;(2)地位、头衔、晋升,以及其他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如办公室的大小和所配备的设施、“经理”的专用秘书、专用汽车、高级俱乐部会籍等;(3)取得领导身份的强烈愿望;(4)竞争的鞭策;(5)恐惧,它的表现形式很多,如恐惧出差错、恐惧失掉工作或减少奖金等;(6)金钱,虽然把它列在最后,但绝不意味着金钱是效能最低的一种激励因素,金钱并不仅是金钱,它一般还是其他各种激励因素的反映(如金钱是成就的象征)。

组织行为学关于企业家激励的研究表明,企业家的激励要以满足其合理需要为前提,而这一合理的需求又是多样化的。这为企业家激励内容的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组织行为学有关企业家激励与普通员工激励的方法,从研究方法上讲是无差异的,两者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作为激励的基础,遵循的是需要—满足逻辑。问题是,需要的满足与行为本身、行为效果,进而与企业绩效之间绝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并且制度环境与市场竞争环境对于企业家激励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2.4 企业家成长的一般规律

企业家成长的规律,是指企业家成长过程中各种因素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企业家的成长与其他专业类型人才的成长相比既有共同的规律性,又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特殊性,即具有特殊规律。从一般意义而言,企业家成长的规律有:

a. 企业家成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依赖的规律

企业家成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首先表现在企业家的成长依赖“时势造英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所有人才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的成长和发展始终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句名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⁸社会环境对人才成长的影响是十分广泛,十分深刻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才成长的社会土壤,是人才取得成功的历史舞台。今天,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发展向我们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同时也提出了培养和造就企业家的任务。因此,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企业家成长的一个重要规律。

b. 企业家在实践中成长的规律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复杂多变,对企业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现代企业家已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家,他们应成为:职业化的经营管理专家、企业杰出的领导者、有勇气和气魄的冒险家、强有力的竞争者和善于处理

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P40

企业内外关系的社会活动家。由此可见，企业家有着特定的内涵，代表着活力和进取精神，绝不等于董事长、总经理的地位和职务。只有在市场经济中经过竞争和科学管理的磨炼和考验，具有丰富的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勇于开拓，敢于冒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才称得上是企业家。前面所述企业家的这些素质，不可能先天具备，有些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有些则只能通过市场竞争和经营管理的实践才能造就。这是因为，企业家必备的一些有别于其他类型人才的特殊素质和能力，均须通过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竞争的实践才能造就。一是企业经营管理的才能要通过经营管理企业的实践才能造就。二是市场竞争观念、风险意识和创新冒险精神，只能在市场竞争的过程和环境中体验造就。三是领导才能也只能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中造就。领导活动不同于抽象的理论研究，是一种综合的实践活动，它必须实实在在地去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在解决问题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形成和提高。同样，指挥协调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也只有在企业经营管理的实践中才能提高。四是社会活动能力也只有在与经营管理有关的社会活动中才能形成和提高。

c. 企业家激励成长的规律

企业家队伍需要有与他们创造性劳动相适应的激励机制，这是推动企业间展开竞争，加快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家就会缺乏动力，从而影响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企业家激励机制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建立和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企业家激励机制，就会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家队伍健康成长。因此，建立健全企业家的激励机制十分必要，这也是企业家成长的重要规律之一。

2.5 政治参与理论

按照政治学的定义，政治参与主要有以下几种含义：a. 认为政治参与就是影响或试图影响公益分配的行为；b. 认为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动或有组织的平民的活动；c. 认为政治参与是个人或个人组成的集体，有意无意地反对或支持、改变或维护一个政治或团体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动（或不行动）；d. 认为政治参与是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意在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抉择的个别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e. 认为政治参与是表示社会成员选择统治者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在公共政策形成等方面的自愿活动；f. 认为政治参与所指的是一般平民直接地、或多或少意欲影响政府人事的选择，以及（或者）他们所采取行动而做的法律行为。⁹

⁹ 《政治学导论》，王仲田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206页

按照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本质是一种社会性事件，是“人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之决定的行为”。¹⁰政治参与者要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就需要组织渠道、机制和程序，这些构成了政治参与的结构，或称为政治参与体制。其主要形式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社会监督体制（如党纪政纪监督、行政监督和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民意表达体制（如信访制度、调研制度、人民公仆接待日制度、政府办公热线等）。

¹⁰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政治学卷》（台湾）。

第3章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最快、市场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经济，赢得了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据统计，目前全市共有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28万家（户），其中个体工商户24.3万户，民营企业3.7万家，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市工业企业总数的99%，民营经济创造的生产总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75%，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6%，上交的税收占全市财政收入的75%，外贸出口额占全市外贸出口总额的95%，从业人员占全市企业职工总数的80%左右。民营经济以其灵活的体制机制优势，在温州经济舞台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地位（见图3.1）。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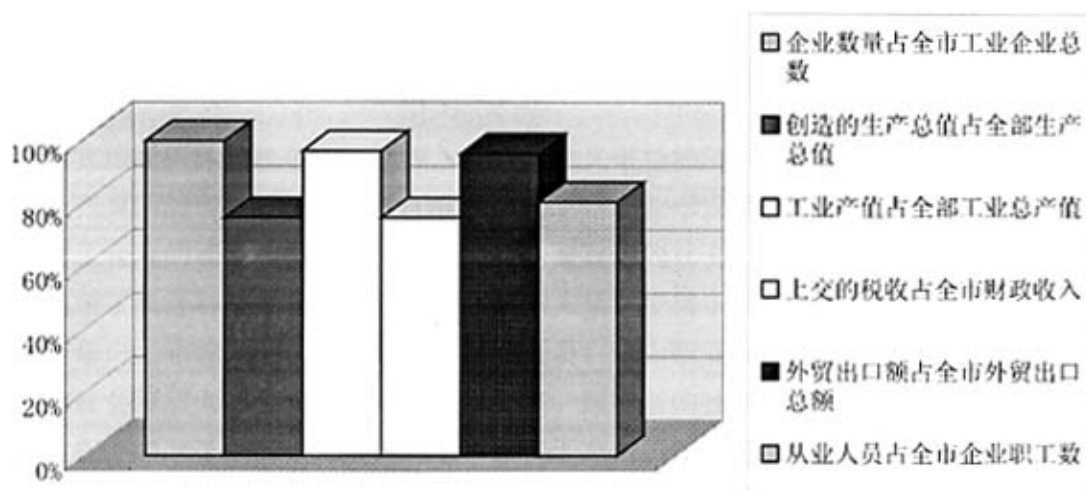


图3.1温州市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状况

相应地，作为全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较早、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现状和特征极具代表性，他们既有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一般特征，更带有浓郁的温州地域和文化特色，他们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不仅为温州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了很多有益和成功的尝试。在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难能可贵的禀赋和精神。

¹¹ 温州市发展计划委员会，《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汇报材料》，2005年4月，P1

3.1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我们党认真总结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制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既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又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引起了我国经济基础的深刻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和不断完善,在灵活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和优化下,就业形式变得多样化,产业结构也进行了合理的调整和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大部分来源于非公有制经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生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顺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进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由此决定了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以及其他新的社会阶层必将产生出来,并且长期存在下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具有必然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温州在国家投资很少、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较早运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发展经济,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私营经济发展呈现蓬勃生机。私营经济因其产权关系明确,具有比“一大二公”、“人人吃大锅饭”的经济强大得多的活力。理论上说,虽然私有制具有惟利是图、见利忘义、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弊端,但是私有制由于生产资料和财产归私人所有,占有关系直接,

没有中介，因此，所有者对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关切度大，生产资料和财产的经营效益与所有者的利益直接相关，其经营体制与经营机制能有效地保证资本和财产所有者利益的实现。正因为私有制具有能唤起人们为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奋斗的优越性，当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的时候，敢为人先、务实创新的温州人在中央推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新政策后毫不犹豫地摆脱旧制度的约束，在中国率先办起了个体私营企业，全面发展个体和民营经济。可以说，我国单一所有制结构的突破既为温州私营经济的成长创造了条件，也是温州企业主群体形成的体制土壤。

3.2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结构和特征分析

3.2.1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结构分析

行业分布：行业集聚程度较高。由于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工业，又由于温州人具有互学互帮互带的文化因子，往往由一个或几个能人发起，带动全镇或全村从事同一行业的生产经营，形成群团式经济结构。比如，温州在二十多年中形成了十多个轻工生产基地。目前，鞋革、服装、电器等十个重点行业产值已经占了工业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三；重点行业中有八类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上，金属外壳打火机高达95%。其中很多产业几乎都聚集在一个县甚至一个小镇上。因而可以说，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行业集群程度相当高。

受教育程度：在逐步提高。调查显示，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创业初期的学历层次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高中为主。如在创办企业时有40.13%为中专、高中毕业，28.80%初中毕业，只有23.31%的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学历的如研究生还不到1%。但温州的私营企业主比较注重学习，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质。经过多年的创业实践和努力，企业主的学历程度有了一定提高，到2003年底调查时止，高中以下的比例在缩小，而大专以上学历提高了14个百分点，研究生达到了3.1%（见表3.1）。

表3.1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	本科	大专	中专（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
创办企业时	0.65%	6.80%	15.86%	40.13%	28.80%	7.77%	0.00%
2003年底	3.1%	11.30%	23.30%	33.10%	22.10%	7.10%	0.00%

年龄构成：以中青年为主。据调查，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年龄大多集中在30-49岁之间，被问卷的652人中，30-39岁162人，40-49岁446人，分别占到了总人数的24.85%和68.40%，是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的主体，且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年纪特别轻（30岁以下）和年纪较大（60岁以上）所占比例都很小，共只有4人，分别占到0.46%和0.16%，且比例还在不断缩小。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平均年龄也呈增加趋势（见图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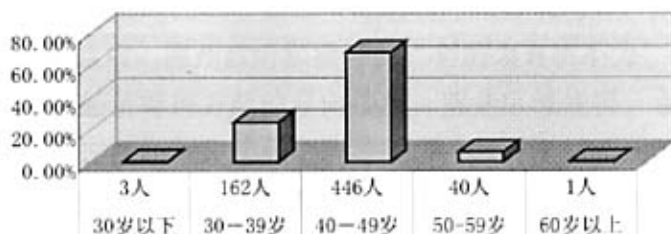


图3.2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年龄结构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到半数以上。610人中，中共党员有182人，占29.8%，这个比例与全国第五次私营企业问卷调查中私营企业主党员所占比例29.9%大体相同，说明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政治上同样比较先进。此外，非中共党员中包括共青团员129人，占21.1%，民主党派19人，占3.1%，一般群众280人，占46%。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加起来的比例超过了50%（见图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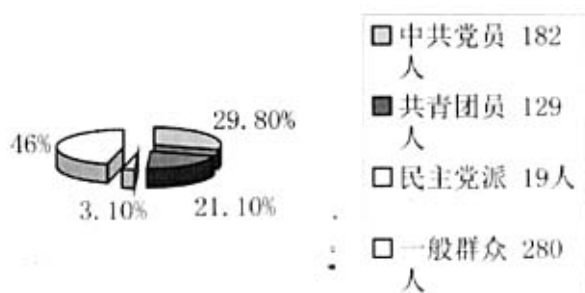


图3.3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面貌

3.2.2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特征分析——“温州模式”下的行为和心理

温州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是在没有取得正式的“改革授权”和充分的“政策资源”的条件下,由民间自发地进行,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温州模式”。尽管外界对“温州模式”说法不一,但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大特征:一是私营经济。私营经济的超前发展无疑是温州区域经济模式中最具特色的方面。二是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温州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资源能够有效地进行配置。三是适度政府。温州政府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定位,较好地发挥了经济管理方面的导向作用。四是区域规模。通过社会化分工协作把分散的小企业连接起来,形成了块状经济,具有区域性规模效益。五是人本经济。温州经济是温州人经济,温州人精神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很大作用。

“温州模式”下的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必然表现出特有的鲜明的行为和心理特征。

首先,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怀有特殊的“感恩”心态。这主要因为温州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多次遭遇“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争论的困扰,政治上几度“沉浮”,经济上背负沉重“包袱”。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南巡”讲话把温州人彻底从体制的束缚和传统观念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可以大胆放手地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并从中得益。因此,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和最大受益者,他们自然对改革开放政策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恩心态,并且大多对此充满信心。2002年温州市委统战部的问卷调查显示,85%的民营企业对改革开放的政策是满意的,在问及“使你事业成功的首要原因是什么”时,76%的人回答“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与支持”,而认为“靠运气好,老天保佑”的仅占6.3%。而温州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阶层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充满了信心。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一样,他们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立场比较鲜明,这一点在部分比较成熟的代表人士身上表现尤为突出。如2000年7月魏京生在美国散布政治谣言,诬陷中国政府压制私营经济发展,正在美国从事商务活动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专门发email给美国一名众议员,并举行记者招待会,现身说法予以驳斥,在美国社会造成较大反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还是对党和国家的政策心存疑虑,对政治风险十分敏感,如一些事业比较成功的企业主积极谋求到国外发展,或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这除了从企业发展角度考虑外,也不排除他

们担心政策日久生变、为自己留退路的因素。

其次，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是一个积极乐观、讲求奉献的群体。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具有较为积极的人生价值观，事业上不断进取，能把个人发展与回报社会、贡献国家结合起来。如当被问及“您认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时，90%的人认为“较应该”或“完全应该”把“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与此同时，“拼命干活多赚钱”也成为93.1%的人的奋斗目标。另外，75.1%的人选择“按自己的兴趣和意愿生活”；64.9%的人倾向于“努力奋斗成为知名企业家”；而“随大流”和“得过且过”则为大多数人所鄙视。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对自身事业现状的认识也比较清醒、客观、积极，对企业在温州的发展充满信心，65.1%的人认为自己“生逢其时，正处在可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21.0%的人表示“虽遭受创业的挫折，但仍有信心干一番事业”，13.9%的人则认为“由于资金及其他方面的原因，影响自己事业的发展”（见图3.4）。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还十分注重回报社会，“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是温州发展的真实写照，其中不乏私营企业家的倾力贡献。他们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积极投身于社会扶贫的“光彩事业”。近三年来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共向温州市县慈善机构捐款近四千万元。而南存辉率领的正泰集团先后为帮残扶贫、抢险救灾、“光彩事业”和“希望工程”等向社会捐资近亿元。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为本地经济建设扛大旗作贡献的同时，也为西部大开发充当“开路先锋”和“排头兵”。2004年，神力集团董事长郑胜涛被授予全国“光彩事业奖章”。2005年，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以其对西部开发的杰出贡献荣膺“西部开发功勋浙商”称号。当然，这个群体中也有少数人思想境界较低，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甚至存在为富不仁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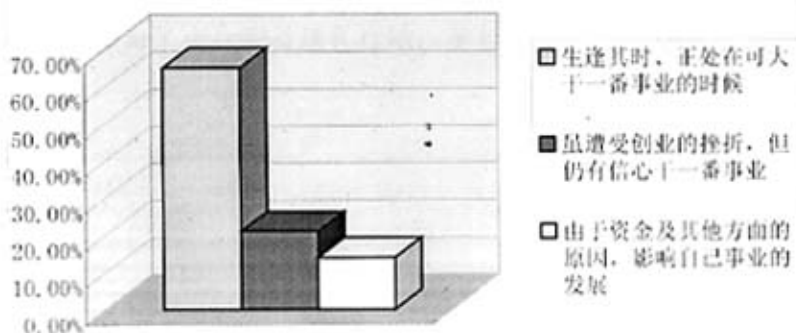


图3.4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对自身事业现状认识

第三,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强烈的参政意识源于其浓厚的商机意识。温州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始于80年代,当时由于没有特定的渠道和场所对其愿望和要求进行疏导和容纳,他们的政治参与总体上呈无序状态。90年代以后,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开始向有序状态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后,根据中央有关精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被纳入统一战线范围,并给予适当的政治安排,使他们能进入人大、政协和工商联参政议政。但温州人关心政治,其实并不在乎政治本身而是其外延,即这种关心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是用来为经济服务的。最近几年,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据问卷调查,45%的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表示关心但不积极参与,33%的人表示关心但积极参与,22%的人表示关心程度一般(见图3.5)。就参政方式而言,选择最多的分别是“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占25.6%)、“与党政领导人经常联系”(占22.3%)、“在媒体上多宣传自己”(占17.5%)(见图3.6)。在近几年的“两会”上,以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为主体的工商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到会率高,发言踊跃,议案提案数量多、质量高,这些都是过去没有的新气象。温州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当个人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之后,更加重视个人的社会地位,并希望对社会发展有所贡献。二是参与政治活动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资本,可以拓宽社会关系网,将私营企业主个人的关系网扩展到本区域之外的县、地区乃至全国公共领域。调查显示,71%的企业主认为“从政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发展企业”,60%的企业主曾经“因为某项政策的出台或政策提示而放弃或者更有信心做某项投资或生意”,只有12%的人认为“从政是为了发挥优势,提供服务”。表明对政治他们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在温州人的眼里,政治蕴涵着巨大的商机和财富。由于政治权力的经济价值很高,温州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欲望甚至极度膨胀。曾有一项调查表明,温州企业主对子女的最大希望不是经商,而是做官,甚至不惜花巨资为子女进入政界架桥铺路。正因如此,少数企业主为了企业利益送礼行贿,参与权钱交易也就不足为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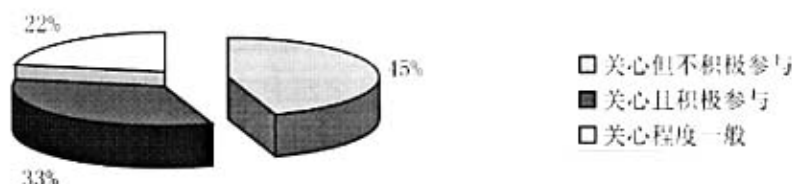


图3.5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对政治关心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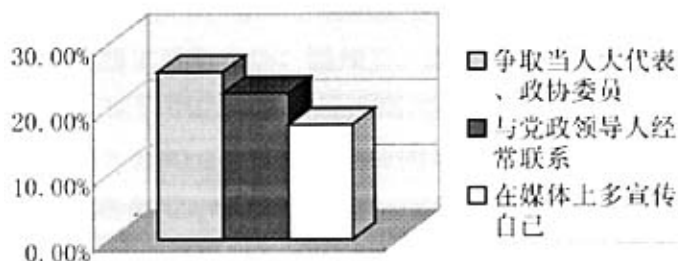


图3.6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参政方式选择

第四，诚信经营正成为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渴求和自觉行动。温州曾经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重灾区，温州经济也曾因此一度走入“死胡同”，特别是1987年在杭州武林广场5000双劣质温州鞋被付之一炬，极大地警醒了温州人。此后在温州市政府的引导下，温州私营企业主联合组建了数十个行业商会（同业公会/行业协会），自觉加强行业自律，推行质量立业、品牌兴业，大大提高了行业质量水平。现在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已经深深懂得，诚信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没有诚信就没有企业的明天，因此他们努力把诚信化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依法纳税，合法经营，不断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如在调查中，对于“赚钱和信用哪个对企业更重要”的问题，赞成“信用更重要”的企业主占69.3%，回答“同等重要”的企业主占30.7%，没人选择“赚钱更重要”。目前温州非公有制经济队伍中不断涌现出“重信用、讲信誉、守信义”的企业。2002年正泰集团被全国工商联、国家税务总局授予“诚信纳税企业”称号，神力集团被省工商联、省中小企业局授予“优秀诚信企业”称号，而被评为温州市“重合同、守信用”先进企业的非公有制企业更是数不胜数了。尽管如此，在部分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身上还存在法治意识不强、偷税漏税、违法经营等情况。有些老板经营办法一

般，但对搞关系网、找保护伞很有一套，他们大搞“权力入股”，花钱买“平安”，以此逃避法律制约。

第五，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具有自主意识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的特质和精神。调查发现：在工作与生活中，86.2%的温州私营企业主坚持“做事由自己作决定，但需要别人支持”；11.5%的企业主认为“一切靠自己，别人靠不住”，表明温州私营企业主具有较强的自主意识（见图3.7）。温州人敢闯敢冒敢试，敢吃第一口螃蟹，由此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前些年，不少媒体广泛报道过的温州人胆大包“天”、胆大包“海”、胆大包“地”，从一个侧面凸现了温州人敢为人先的精神。而伴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眼下，温州人的投资触角开始深入到国家垄断行业：“炒煤”、“炒金银矿”、“炒电”、“炒油井”……温州人恋乡不恋土，走南闯北筑码头打天下。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温州货、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远离故土，寻找自己的落脚点。据不完全统计，在海外的温州人有40万；在国内创业的则有160万，占了温州全市常住人口的近1/4。温州人吃苦耐劳，“既能当老板，又能睡地板”。温州的许多老板、企业家出身于修鞋匠、裁缝、供销员，吃苦和拼搏精神都很强。温州人不断进取，善于开拓。比如，温州可利用的资源非常少，但温州人的创造精神能够“无中生有”。温州的水头镇、郭溪镇，没有什么畜牧业，却成为全国最大的皮革生产基地；龙港镇、宜山镇不产棉花，纺织企业也没有，却成为再生布的生产基地；温州没有汽车生产企业，过去也没有摩托车生产企业，塘下镇却成为全国四大汽摩配生产和销售基地。这被称为温州发展中的“零资源现象”。上述“温州人精神”固然可喜，但在强烈的自主意识的背后也暴露出温州私营企业主过于自负、难以容人的缺点，“人人想当老板”、“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老板情结”，在较大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联合与发展。



图3.7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自主性调查

第六，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注重合作互助、善于“抱团”发展、务实而讲究效益。不少发展商均指出，单独看温州人个体，实力未必最大，但是温州人“抱团”集体行动的特性，使温商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一个群体。“奥康”去重庆璧山建立西部鞋都，众多配套企业跟着走；打火机整个产业链往慈溪市迁移；合成革产业则整体迁往丽水；应对宏观调控，9家民企一联合就搞出个中国第一民间财团来。温州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有钱大家赚”。追究起来，温州经济的原动力，很大程度上是民间借贷立了汗马功劳，而这，也是与温州人的“抱团”精神分不开的。在国外，温州人的这种“抱团”精神同样得到体现。美国纽约法拉盛的温州老板开的超市，也是一家又一家，“瓯江”、“大丰”、“中国城”、“新中国城”、“金城发”等，如此“抱团”把生意做在一起，相互之间难免竞争激烈。对此，温州人却认为集中经营一可以占有市场，别人进不来，二可以扩大市场，创造更多的商机。温州人的“抱团”精神还体现在他们的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上。如庄吉集团的创始人陈敏原本是企业的董事长，为了全心全意当好温州市工商联副会长、温州市服装商会会长的职务，陈敏将董事长一职移交给他的合伙人，而他自己在公司里只担任监事一职，目的是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地为商会服务。温州打火机打赢反倾销官司就是在温州商会组织下获得的胜利。当然，如果温州人过于沉醉于自己的乡音乡情圈子，其“抱团”行为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温州人的经济，是一种基于地缘人缘亲缘来维系的人格化交易方式，温州人大多在内部融资，温州人抱团做生意。”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这是一种相对比较封闭的商圈，限制了其大规模引进新资本、新人才，因此只能在各地进行简单复制，或者靠抢占先机取胜。

上述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是经济上的“温州模式”的特定产物，更是温州鲜明的地域文化造就的结果。比如，温州自然资源十分匮乏，人多地少，出于谋生所迫，温州人自古就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善于捕捉各种商业机会，勇于外出经营谋生。又如，在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再如，温州历史上的两次对外开放的经历，使得温州人在面对第三次开放(即改革开放)的时候，有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和能力准备，在别的地区还在等待观望的时候，温州人却似久旱逢甘霖，如鱼得水般开始了改革的行动。更重要的是，温州在宋代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与儒家“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正统思想相悖的永嘉学派，它的功利、重商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温州人，使他们具有了强烈的致富欲望和创业意识、吃苦耐劳和百折不挠的意志、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和超前思维、“血浓于水”的血缘团队精神等。当然，温州的地域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性，笔者在上述分析时已指出，温州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特征中也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和负面因素，值得引起我们重视和反思。

3.3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发展趋势

3.3.1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2004年在郑州召开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分析会上，全国工商联的有关专家在分析我国民营经济未来发展走向时认为，我国民营企业健康成长继续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主旋律。由于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私营企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私营企业主的财产也会不断增加。尤其是随着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政策的明朗化，必然有大批的国有、集体企业转制为非公有制企业，通过控股或参股而形成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更多的个体工商户将把积累起来的资金投入生产创办私营企业。同时，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熟的大好形势下，也必然激发有志者从事非公有制经济。因此可以预见，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队伍将呈现不断壮大的趋势。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产品的升级及技术的更新，许多温州企业主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素质、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跟不上形势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提高个人素质、完善知识结构的内在要求，并采取各种措施予以弥补。他们订阅报刊杂志、学习技术和政策、到大专院校进修，与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合作进行技术开发等，一方面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增加科技含量，以增强未来企业的竞争力，另方面努力提高员工和自身文化素质。温州不少企业家不惜卸下企业管理的重任，到国内外知名高等院校“充电”，有的还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文化根基。调查表明，温州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基本呈提高趋势，从1993年到2002年，大学毕业生的比例上升了50%以上，研究生更是上升了四倍多。另外，近年来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包括具有各种职称的科技工作者和公职人员加入了私营企业主的行列，成为新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这些新的代表人士大部分受过高等院校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知识，有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源和较强的事业心，因此更使这个群体的智力结构和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

3.3.2 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参与能力显著增强

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相应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他们的利

益诉求和政治参与欲望将更为强烈，参政能力也日渐提高。经济地位的提升使得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比一般公众有更多更直接的参政议政渠道，“表达利益的机会大大增加了，政治参与的层次也大大提高了”，¹²并由“旁观型活动”转向了“过渡型活动”，经济实力足够大的私营企业主还在向“决策活动”移动。¹³有目共睹的是，在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短短两个月里，一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迅速走向中国政治舞台，其数量之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如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这是私营企业家首次进入省级政协领导班子；资产超过8亿的私营企业家、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们都是以工商联会长的身份当选这一职务的。继十六大上出现非公经济人士代表后，新阶层人物大量出现在全国各地各级立法机构和参政议政机构中，具有很强的现实和象征意义。由此看来，无论在温州还是全国范围内，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正表现出以下三个明显的趋势：

一是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将从原来的象征意义发展成为实际的参政、议政。目前我国的“老板从政”尚处于“初级阶段”，更多的是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但随着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这个阶层的政治地位更加提高，在共同政治利益的推动下，他们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愿将更加强烈，政治参与的层次也更高、范围更广，发展的空间还很大。参与形式之一就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直接发挥作用，如被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主被选为村民委员会主任。浙江省十届人大的641名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共有96人，占15%左右，其中大多数是私营企业家。温州的情况更为典型，单单一个乐清市柳市镇的私营企业家中竟然走出了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和二位全国政协委员。在2003年温州召开的“两会”上，选举了一位私营企业主担任温州市政协副主席。而推举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担任工商联会长在温州已有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这种模式也在各县（市、区）推开。另一种参与政治的形式是在地方政府内部寻找政治代言人。假如不能直接参与政治活动，私营企业主就要寻找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来反映自己的政治利益。这种情况在温州也相当普遍，一些经营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高薪聘请党委或政府的退休退职干部做公司办公室主任或企业顾问，有的甚至担任高层领导职务，利用他们原来建立的关系网和资源，为企业疏通各种关系渠道，提供便利条件。

二是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将逐渐从被动转向主动地提出政治要求。由于传

¹² 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1.

¹³ L.W.Mibra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ow and Why Do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Rand McNally, 1965.

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地位一直无法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受到很大局限。目前的“私营企业主从政”基本上还是属于政府让你“从政”，谁当人大代表，谁当政协委员，主要是由党委或政府决定的。但从发展的趋势来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尽管总体上看他们尚未形成自觉的、统一的政治要求，但是私营企业主阶层正试图提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并实现一定的政治参与，以表达其阶层意识和合法权益，一部分综合素质较高、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开始积极地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要求，并努力在一定的场合以一定的方式反映出来。随着私营企业主政治上的要求越来越强烈，他们的参与会变得越来越主动，如有些私营企业主提出要办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以经常反映他们的愿望、要求和意见；温州的民营企业家协会，不仅有章程、会刊，还在社会上举行各种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与外商直接洽谈业务，为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与有关部门及国际机构交涉等。这是市场经济不断发育的条件下必然伴生的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也是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在政治上不断成熟、进步的自然历程。

三是私营企业主的参政目的将由关注本阶层的阶层利益转而逐步形成关注全局性、公益性的社会利益。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中的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过程大致已经历了“功利型、经济性的政治参与”到“民主型、公益性政治参与”，再到“开始追求的参政议政新境界，将自身定位成一个执意要对社会负责的阶段性参政议政角色”三个阶段。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成熟与发展，随着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加强，今后就总体而言，他们单纯的政治满足感、社会认可感、个人社会地位与成就意识当会逐步淡化，而置身于公益性立场参政议政的自觉意识必会继续升华。总之，无论是政协方面，还是人大方面，私营企业主委员、代表在正式利益表达中，均是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己任的，以竭力反映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表达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这种代表公众性质的政治参与，能够扩大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渠道，提高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能力水平。¹⁴

3.3.3 社会地位的变迁与社会责任的分配——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必然选择

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逐步提升，社会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且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无论是社会经济生活，还是政治生活、法律生活、文化生活都可以看到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以肯定，这一群体的经济、

¹⁴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商务印书馆，1999：43。

政治和社会地位还将持续上升,其影响力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逐渐增大。据调查,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职业声望仅次于“国家和社会管理者”,位居第二;而当调查要求温州市民给各种人群对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行排序的时候,私营企业主群体也是排在第二位,足见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已今非昔比。

当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后,他们面临的的就是社会责任的分配。社会责任(Society Responsibility SR)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名词。对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的一些学者通常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决策者采取保护与促进社会福利行动的义务;琼斯福·马可圭里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仅负有经济与法律上的义务,而且更负有超越这些义务的其他责任。具体就企业来说,发展生产、遵规守法、主动向国家纳税是他们的责任,扶贫济困、为弱势群体献爱心、投身“光彩事业”是他们的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反映民众呼声也是他们的责任。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得好:财富的集聚意味着责任的集聚。近几年,一个可喜的变化是,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已开始关注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并为之不懈努力。在过去的理解中,很多企业只关注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认为只要企业能赢利、纳税就是尽到了责任,或者仅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同于社会公益事业,而忽略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即对安全生产、职业健康、劳动者合法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等的关注。而现在的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对社会责任感的认识已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如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他们的议案、提案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个人所涉及的产业和领域,而是关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将民营企业所要承担的对于生产安全、职业健康、劳动者合法权益以及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摆在了突出位置。如2004年3月,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天正集团总裁高天乐向大会提交了两个提案,内容分别是《关于建立解决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的建议》和《关于注重战略规划,延续民企辉煌的建议》,他还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观念,强调企业责任就是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要对员工负责、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资源环境负责。同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精心准备的几个提案也呼吁民营企业要把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作为自己的应尽职责,为此他特地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到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考察调研市场,还专程赴法国、德国、荷兰、日本等地考察。

第4章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现状与问题

4.1 温州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方面的有益探索

作为全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最快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温州在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工作方面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生存、安全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其关注的焦点将向社交、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转移。从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目前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其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对于满足感的贡献度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这一群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想在经济领域之外实现自己的价值，温州统战部的调研表明，政治需求正在成为这一精英群体的主导需求之一。多年来，温州市统战等有关部门立足实际，创新机制，以思想教育为手段，以满足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主导需求——政治需求为重点，进行大胆实践和有益探索，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概括地讲，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4.1.1 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政治认同

温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不断开放，使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的趋向，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或多或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其中某些不良影响容易误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产生政治上的负面效应。从统战工作的目的来看，培养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既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强化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认同的需要，使之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有机力量。多年来，温州市委和统战部门在理解把握中央相关精神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形式多样而富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明晓政治大势，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具体的政治环境相结合。其做法主要是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培训。例如：十六大闭幕后不久，市工商联组织开展了“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做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专门活动，特邀了党的十六大代表、商会副会长丁国聪给部分代表人士和会机关干部作专题辅导报告；组织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听取市委宣传部领导作十六大精神学习专题辅导报告；举办由市属各行业商会会长参加的“全国看温州，温州学全国”解放思想讨论会；温州市委统战部则组织了近70名由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担任的工商联会长和部分企业家代表赴中央党校学习等，均取得了很好的教育培训效果。

4.1.2 以“光彩事业”载体强化社会责任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作为社会中先富的特殊群体,在带领全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光彩事业”就是一个有效载体。温州市“光彩事业”起步早,参加的非公经济企业家多,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光彩事业”与“希望工程”相结合、“光彩事业”与边、穷、老、少地区的开发性投资项目相结合、根据企业经营特点进行对口扶贫等。近几年来,温州市有关部门以“光彩事业”为载体,有效地架起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这一社会强势群体与社会弱势群体之间的桥梁,促进两个群体间的情感认同,一定程度上弥平了两极分化,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促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更深刻地认识到其肩负的社会责任。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的引导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参与了国企改革和西部开发、积极参与再就业工作、参与扶贫助学和社会慈善事业等,取得了累累硕果。如:奥康鞋业与重庆璧山区人民政府签约计划投资8亿元打造“西部鞋都”;巨一集团为平阳矾矿下岗职工安置50个就业岗位;浙江圣雄集团为希望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捐资达3000多万元;南存辉、胡成中倡议发起全国首家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并集资数亿元等。据统计,1994年以来,温州“光彩事业”总投资已达到23.6亿元。

4.1.3 以行业协会纽带激发建设潜能

在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工商联充分利用并发挥民间行业商会这一植根于市场经济的中介组织的作用,直接投身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并为之做出了应有的努力。活跃的民间行业商会,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规范和促进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到2004年上半年止,温州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14家,这些商会(协会)在行业自律、拓展市场、维护权益、整合产业、应对入世、协调关系、自我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温州市将对行业商会、协会工作的指导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大多是各个行业的精英,在自身的行业中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因此,温州有关部门有意识地扶持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相关行业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并对其工作给予有力的支持,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行业中充分发挥领头雁的作用。这种将行业协会指导与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相结合的做法,极大地锻炼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管理经济的能力,同时促进了行业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

4.1.4 以政治待遇安排引导参政需求

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活跃分子，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从业的过程较容易萌发自身的从政需求、从政期待。温州有关部门认识到，把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上的追求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显得非常必要。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采取了多管齐下的做法：其一，建立、健全和完善代表人士的档案。摸清代表人士的底细，建档立案，并通过经常接触，保持对其情况的了解，注重动态地把握他们的思想脉搏和经营状况。其二，提供参政载体，为条件成熟的对象“搭台唱戏”。根据不同的情况，向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提供工商联执委或行业商会负责人的社会团体领导职位及向人大、政协举荐，使其走上政治舞台。据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联系机构市工商联2004年的统计，全市工商联会员中共有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963名，其中全国人大代表3名，全国政协委员3名；省人大代表18名，省政协委员6名；市人大代表134名，市政协委员70名；县人大代表285名，县政协委员444名；加上近千名行业商会理事以上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见图4.1）。一支政治素质较高、企业实力较强、社会形象较好的代表人士队伍蔚然成形。其三，加强参政议政指导。针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参政议政能力参差不齐的现状，温州有关部门专门邀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为其做提案指导，较大地提升了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大的参政议政能力。其四，给予较高规格的政治待遇。以2003年两会换届为契机，经考察筛选，将一批政治思想好、个人品德佳、对社会贡献大、有社会责任感、有一定参政议政能力的优秀非公经济代表人物推上了工商联领导位置。当前，市工商联和8个县（市、区）工商联会长由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担任，担任工商联副会长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更是为数不少。同时，为使工商联（商会）会长发挥实实在在的政治作用，当上级领导莅临部门检查指导工作时，经常安排非公企业家会长陪同，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全市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向市领导反映情况、表达期盼，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积极性，形成了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势。



图4.1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地位

4.1.5 以服务培训措施提升综合能力

在我国,当前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多从草根阶层自发成长起来,在其积累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同时,亦存在缺乏实践高度和理论深度的问题。因此,扩展其宏观视野,提升其综合能力,有助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成长及非公经济发展。此项工作在温州经验体现为:给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提供有效的服务、培训,满足其经济需求和知识需求。满足经济需求着眼于内外兼修:在国内,温州市工商联多次组织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赴“长三角”、云南、湖北、江西、东北等全国各地学习考察,与当地企业界代表人士深入探讨、取长补短、捕捉商机、共谋发展,扩大非公企业代表人士的经济合作面,有力地培植了经济发展能力。面向国际,温州工商联提供了欧洲温州华人华侨联合会这一友好商会的桥梁,引导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与海(境)外工商社团进行交流与联系,推进视野的全球化。满足知识需求立足于双管齐下:一是建立系统学习模式,如与清华大学等联合创办了MBA温州培训中心,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者创新能力和管理素质;二是创造头脑风暴效应,如邀请了中外著名专家、资深学者,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开办多场讲座、论坛,更新了经营理念,加快与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速度。

4.2 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

尽管温州在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是一个新生事物,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也不多,因此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本文认为,培养内容单一、培养手段匮乏、工作方法呆板、培养观念陈旧、工作机制欠缺、合力形成不够以及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学习意识不强等,是目前这项工作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培养造就健康合格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最大障碍。

4.2.1 培养内容单一、重点不够突出

要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进行有效培养,首先要确定培养内容,明确培养重点。自中央明确提出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至今,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状况也有了很大改变,而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内容和重点却没有与时俱进,作相

应的调整。有关部门对于培养内容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更缺乏计划性,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随意性较强。而且,其内容主要还仅仅停留在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而其他更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所需的诸如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参政议政能力的培养、全球化观念和战略思维的引导以及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育等,还没有被列入培养的议事日程,使得培养重点不够突出,缺乏有效性。

4.2.2 培养手段匮乏、方法过于简单

多年以来,我们几乎沿用同一种模式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培养。从思想教育方面看,教育手段不能体现出针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特殊性,有浓厚的教条化的倾向。如教育缺乏层次性,对不同层次对象的教育,没有区分不同层次的要求,没有进行个性化培养和分类指导。教育方法比较陈旧,开会讲话多,深入基层少;一般号召多,因人施教少;空洞说教多,将心比心少。从政治安排看,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安排尚处在试验性的阶段,在全国范围内,探索的步伐大小不一,如沿海走得快一些,内地走得慢一些,政治参与的覆盖面也远不能满足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现实需要。而且因为从物色、培养、考察、推荐到审批没有建立和执行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制度,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人选的考察和评价还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导向性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使政治安排出现“卖人情”现象,影响安排质量。因此,不少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对党的培养政策采取观望态度。此外,培养手段还不够多样化,在新形势下,还需探索其他生动活泼而行之有效的途径和形式,如举办沙龙、研讨会、利用电子网络手段进行信息通报和交流等。

4.2.3 培养意识不足、力量难以整合

一是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重视不足。非公经济迅猛发展是大势所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群体的增长将是必然结果。党和国家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日趋开放,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态度也日渐明朗。但有关部门对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战略意义和重要性尚缺乏认识,以应付性态度对待工作较为常见,出现重经济指标考核、轻思想政治工作、重强化发展私营个体经济意识、轻对私营个体业主教育引导的倾向。二是对如何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有信心危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是改革开放以后产生的新生群体,对于这个群体的属性,尚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如何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缺乏专业性的有效培训或指南。在全国范围内,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机构如统战部、工商联等,均依着“摸石头

过河”的原则摸索工作。加上统战部、工商联等机构不属于强势的行政部门，人员结构老化，专业知识欠缺，面对生机勃勃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群体，工作人员普遍感到底气不足，甚至不知如何与之融洽相处、流畅沟通，对如何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心存迷茫，缺乏足够信心。因此，个别部门的培养工作形同虚设。三是工作体制不顺，力量难以整合。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虽然从工作职能上是以统战部门（工商联）为主，但它又是一个牵涉到方方面面力量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关党委部门和政府职能部门的共同配合。而目前的状况是各部门各行其是，相互之间没有衔接和协调，资源没有共享，力量没有整合，形不成培养的合力。因此急需建立一种齐抓共管的协调的工作机制。

4.2.4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学习意识不强

非公有制企业主绝大部分来源于本乡本土的农民、待业青年、国有单位的停薪留职者、城郊农民等，总体素质本来不高。一些人在创业初期抓住了机遇，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中脱颖而出，克服了自身教育和文化程度的先天不足，显露出在经营决策方面超前的胆识，以及较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应变性，成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内部管理提升的压力显现，这部分企业家在能力上的不逮势必逐步显现出来。由于他们知识背景薄弱、基础较差，学习能力相对也比较薄弱，因此自我提升就受到了很大限制。所以当温州企业家从实践中获得的知识被锁定的时候，由于基础性知识的缺乏，他们无法转向更新、更有潜力、然而要求也是更高的领域。还有一些企业家总是抱怨自己工作太忙、应酬太多，抽不出时间来学习，或对学习培训教育抱被动应付态度，其实说到底还是对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学习重视不够，学习愿望不强烈，没有意识到“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不懂得妥善安排自己的学习时间。更有少数民营企业企业家取得暂时成功后衍生浮躁心理，缺乏精神追求，却竭力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不再有事业的冲动，可想而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多大的问题。

第5章 进一步完善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急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根据党的统一战线关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的基本标志和基本要求及“三个结合”的具体要求，同时根据企业家的领导素质论中有关领导素质的特性和内涵，并针对当前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存在的素质缺陷以及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企业家成长的规律特点，本文认为，完善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其次由于培养工作的当务之急是提高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素质，必须进一步明确素质培养的基本内容。再者由于培养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措施，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推动培养工作的多种内在机制，包括领导协调、培训教育、考核评价、激励约束等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成长的政策、法律、舆论和市场环境；同时还要借助于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从而使培养工作得到切实改进，取得新的成效。

5.1 充分认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

现代经济生活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为企业家，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独立的企业家阶层已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企业家既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早在30年代，经济学家熊彼特就明确指出，企业家以“创造性毁灭者”的角色充当了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一国的企业家人力资源存量越大，则经济创新和结构转换的能力就越强，经济增长就越快；而缺乏企业家的结果只能是创新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结构单一；企业家群体的出现会引起经济增长波（熊彼特，1932）。在我国进入自主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今天，企业家的作用更是不可低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在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也势在必行。因此，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5.1.1 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非公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温州的发展经验而言,它的作用表现在:一是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1978至2002年,温州国内生产总值从13.2亿元增加到1054.99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加到126.26亿元。二是推动了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温州10大专业市场和10万供销大军,到全市城乡建立的500余各类商品市场、全国各地建立的100多个大型的专业市场,40多万个销售网点,均极大地刺激了消费、拉动了需求、繁荣了市场。三是扩大了就业。由于非公经济的发展,100多万农业劳动者向二三产业转移,160多万温州人向全国各地转移,并吸纳了100多万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和技术管理人才来温就业。四是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借助于非公经济的发展,温州市小城镇从改革开放前的18个发展到现在的128个,这些卫星镇人口占全市60%以上。随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三十六条”)的出台,非公有制经济必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更加凸显,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也必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必须创造适宜的环境,使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心无旁骛地紧跟党的领导,共同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辉煌。加强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并给予其适当的政治待遇和社会地位,则能使整个非公经济人士群体形成示范效应,产生对党的向心效应,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认同效应,并进而生发出社会责任感、民族使命感,切实地推动非公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国家的复兴自觉地贡献力量。

5.1.2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

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人才资源已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提出要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作为中国企业家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公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既是管理人才,又是领导人才,他们的素质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国家的整体素质如何。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队伍中也不乏受过高层教育和综合素质较高的优秀人才,但从总体上讲,这支队伍在受教育因素方面明显低于国有和集体企业管理队伍,素质偏低是这一队伍的突出特点,这与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还很不相称。今天,尽管我们也采取一些手段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

原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这支队伍在思想道德、文化教育、科技创新、现代化管理等方面因素的提高,还仍然比较滞后。和企业家队伍中其他成分相比,非公企业家是在组织领导生产经营过程中与所有企业同步产生成长起来的,他们不是行政任命的产物,而注定要由竞争激烈的市场来造就。因此,从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社会和组织现代化建设职能的角度讲,从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我们必须树立新的人才观,把非公企业家队伍的培养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工程”培育范畴,加大对非公企业家队伍的教育培养力度,着力提高其综合素质,使之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需要,让更多的非公经济管理人才脱颖而出。

5.1.3 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需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当非公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经济群体成为当代社会中影响日益彰显的一股社会力量,对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开展有效的工作已经是党处理国家事务时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是执政党不断扩大的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执政必须团结和依靠的重要力量。实践“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必然要求进一步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实践已经证明,非公经济人士群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群众基础。而从现实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不仅日益积极地参政议政,还登上了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文明单位、思想政治工作先进个人等各种荣誉的领奖台。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非公经济代表的身影。这充分说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作用和社会贡献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认同,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积极分子队伍已初步形成。实践已经证明,非公经济人士群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政治基础。十六大提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最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壮大企业家阶层,逐步扩大中间收入者阶层的比例,推动形成最有利于中国科学发展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结构。实践已经证明,非公经济人士群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已经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社会基础。

5.1.4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方方面面因素和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作为社会中一个群体、一份因素、一股力量的代表，他们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性，能引领他们所联系群体的发展方向；同时他们的行为特征有着较强的张力，其思想倾向则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加之拥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使其逐渐成为“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¹⁵因此，如何协调好、引导好、使用好这股力量，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正向”力量，并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是我们党和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其原因在于：A.做好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自身企业，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再就业工程等社会公益事业、帮助党和政府做好扶贫工作、缩小贫富差距，有助于缓和、协调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形成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B.疏通渠道，创造民主宽松的环境，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正确表达他们的利益需求，顺利排解心中的烦愁和忧虑，有利于构建良性有序的利益表达机制，安定人心，带动和促使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在法律框架内行使他们的权利，形成良好的社会民主法治环境。C.积极帮助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为其提供政策咨询、信贷沟通、职业培训、对上争取等服务，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放宽民资投资领域，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增强非公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5.2 明确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素质培养的主要内容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就其属性而言，首先是一个企业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很多人还是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因此必须要具备一个管理者和领导者应当具有的各项基本素质；而与此同时，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作为非公经济人士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还承担在现有的政治构架内充分表达群体利益的责任，又必须具备相应的政治参与能力。据此，认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素质培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5.2.1 德行素质

¹⁵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德行素质主要包括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思想素质等。首先，高素质的企业家政治上成熟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特有要求。政治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必须讲政治，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事。”企业家要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洞察力，这样才能明辨大是大非，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不迷失方向。要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运行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模范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增强全局观念和危机意识，把远大的政治目标同企业实际相合起来，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使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发展。其次，要教育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爱国敬业，富有社会责任感，把经营管理好企业当作一种高尚的职业，把回报社会、奉献社会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这种崇高的敬业精神与德鲁克提出的变革的企业家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如果一个企业经营者没有敬业精神，他不可能不断地去寻求推动企业发展的变革，即便是做出一些变革，也大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同时，要引导他们诚实守信，知法守法，义利兼顾，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企业、职工利益之间的关系，“要把自身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要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要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

5.2.2 知识素质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于一个企业家的重要性越来越突显，企业家观念的更新和才能的提高也要以知识为基础和条件。一个优秀企业家应具有解决管理、技术、商业、财务和其他一切需要他解决的问题所必要的知识。一般而言，企业家知识的框架主要包括三大类知识，即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方面的知识，也即领导者的知识结构。企业家知识素质同他所受的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在国外，企业家必须受过正规高级教育，例如：美国的公司决策者必须获得硕士学位，有经验的在职人员要想成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到大学进行培训，拿到硕士学位。在我国尤其是在温州，面对企业经营者文化层次普遍偏低的现象，更要注意避免一些不规范、无益于企业管理的方式，如：看不懂“资产负债表”，却主持着一个企业的经营工作；没有基本的金融知识，却到处搞融资、筹资或股票上市；小懂经营风险，却要搞扩张、重组或多角经营，等等。现代企业家不仅是管理阶层，也是高知识阶层，尤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迈进，企业家知识更新迫在眉睫，必须尽快掌握现代管理知识，除深刻掌握一般管理知识、专业科技知识外，还应该较好地掌握金融知识、法律知识、信

息知识和计算机知识以及外国语。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必须懂得高新技术，把握高新技术资产的本质；必须懂得资本运营和风险投资管理，以更好和更高效地运用资产；必须懂得人力资源管理，以更好地识人和用人。总之，今后对企业家在学历、学位和职称等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企业家们必须进一步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适应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要求。

5.2.3 能力素质

主要包括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参政能力等。管理能力是衡量企业家是否合格的最重要标志。管理包括很多，如生产管理，经营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企业家必须能随时代的变化、经济水平的发展以及企业发展不断更新自己的经营管理知识，更新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要随时关注世界范围的管理思想变革，适当地运用到自己的企业中。一个管好了人、用好了人的企业，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家最重要的特征，熊彼特的“创新说”更是认为，企业家的本质特点就是创新。创新是一个企业能否发展壮大的灵魂，是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目前我国企业正从“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在这种全新的经济模式下，企业家必须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开拓新的产业，开辟新的市场，根据市场需求投放产品，采取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此外，新形势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还必须具有较强的参政能力。现阶段，非公企业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具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要求的社会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阶层队伍的扩大，他们的阶层意识逐渐明显，政治需求日益强烈，能够积极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并将自己普遍关心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诉求。而目前一些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参政水平与所担负的职责不相适应，影响了他们的参政效果。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要更多地关注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培养敏锐的观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客观的分析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质、理论政策水平和表达能力，才能提高参政能力。

5.3 建立健全推动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多种机制

5.3.1 领导协调机制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处理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因此，建立和完善领导协调机制至关重要。首先，要建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新形势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面广量大，涉及部门多，需协调处理的问题多，单靠哪一个部门的工作是很难奏效的。应加强党的领导，建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参加、有关职能部门组成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分工负责，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要扩大代表人士档案库，把更多优秀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纳入视野；坚持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联系制度，动态地把握他们的经营状况和思想表现；建立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情况通报和研讨制度，及时了解和总结交流有关情况。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工商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经济人士的桥梁和纽带、政府管理非公有经济助手的作用。其次，要帮助协调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为其解决实际困难。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不仅要受市场制约，同时也会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如近几年，温州个体私营经济虽然得到较快发展，但制约个私经济发展和困扰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因素仍然很多，如融资难、土地能源等要素制约、政府优惠政策不能落实、多头管理、“三乱”问题未得到根本治理等。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还希望与各级党政部门以及领导干部保持密切联系，加强对话和沟通，更方便地反映意见和建议。我们要根据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给予一些具体的帮助。如要充分发挥统战部门及工商联的优势，通过政策指导、信息服务、组织展销、协调关系等多种形式，帮助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解决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采取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协商会、联谊会等形式，让非公经济代表人士与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面对面交流，争取彼此间的沟通与配合，尤其是帮助非公经济企业协调好与工商、税务等部门的关系，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5.3.2 教育培训机制

教育培训是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最重要手段。一要突出教育培训重点。企业家是具有一定理论政策水平和较强决策指挥、组织协调、市场应变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外向型、开拓型人才。要采取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迅速建立起以思想素质提升和业务素质提升为重点的教育培训体系。思想方面主要是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法制意识的强化等。业务方面则要针对企业家需求，推出一套完整、科学、实用的工商管理研修课程，提高培训的系统性和针对性，保证培训的质量。要根据各地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不同特点，突出教育培训的重点方面，而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哪方面不足就着重从哪方面入手予以强化。比如对于温州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他们最大的缺点在于

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缺乏长远眼光、企业小打小闹、“老板”情结严重等，因此要重点在提高文化素质、增强法制意识、树立长远眼光、遵循市场法则、做大做强企业、增强合作共赢意识等方面加强教育，做好引导。同时要把教育贯穿于一些具体活动中，如诚信宣传服务月活动、创建文明先进行业活动、扶贫献爱心活动等，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诚信经营、努力创业、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各项社会公益事业。要加强企业家之间的联谊和交流，促进官、产、学相结合，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提供多方面服务。二要建立培训教育基地。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训基地的建立，可以充分利用各级机关党校、干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施、教育资源，大力扩展学校培训企业家的功能；同时，加强与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高等院校的联合，通过挂钩“联姻”，委托高校代办、与国外联办等形式，花大力气全面培养企业家人才。培训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讲求实效。可以是长期培训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相结合、课堂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也可以是岗位自学与脱产培训相结合、总结交流与课题研讨相结合。

5.3.3 考核评价机制

目前我们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评价基本上是以经济指标为依据，即以对企业的评价来代替对企业家的评价。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重视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却忽视了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培养，因而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评价缺乏科学统一的标准，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存在重经济、轻政治的倾向，在选拔、推荐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政治安排时，也没有形成一套科学规范、客观公正、行之有效的程序。因此，急需建立一套由多种评价方法组合而成的科学评价体系和综合评价机制。建议建立由统战部门（工商联）牵头、政府相关部门（如发改委、劳动与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环保等部门）和民间机构参与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测评中心，负责对企业家行为进行跟踪记录，以对企业家人能力和综合素质作出系统、科学的评估，形成科学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评价机制。该机构应从实际出发，对考评的内容、标准、结果的处理作出科学的规范，制定出一套完整有效的、适合中国国情和温州实际又符合国际惯例的测评指标、考核方式和程序。评价内容应包括思想政治表现、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和企业经营管理状况等方面。

5.3.4 激励约束机制

根据激励理论，激励的作用是为满足个体某些需要和动机，具体来说，是满

足企业家的合理需要,对企业家需要的满足可以驱使(诱导、激励)企业家朝向企业组织的目标而努力。激励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这里主要谈谈精神激励的问题。(1)声誉激励。按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贡献的大小,授予不同的荣誉称号,通过各种传媒,广泛宣传企业家的地位、作用、业绩和企业家精神,形成尊重企业家、关心企业家、保护企业家的良好社会环境,使企业家的劳动和价值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的愿望得到满足。(2)满足他们的政治需求,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工作力度,增加人大、政协中企业家代表的比例,通过撰写提案议案、参与政务监督和政府决策顾问等,拓宽企业家参政议政的渠道;通过企业家协会、行业协会,做到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和谐沟通,让企业家受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得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递进式的激励机制,才能在塑造、建立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并使之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我们在建立起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行为的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当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有了约束机制,就能使企业家的行为更加规范,更加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and 繁荣,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约束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责任约束。企业家素质中有一条是社会责任感,这里的责任感应当是企业家对财产所有者、对顾客、对职工、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包括使财产所有者获得最佳的利润回报,实现资产的增值;为顾客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职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向国家上缴利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等。(2)法律约束。通过一系列的法的实施,规范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使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而使企业向着有利于社会安定繁荣的方向发展。(3)道德约束。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在政治思想品德方面,应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强烈的事业心;在职业道德方面,应能廉洁奉公、尽职尽责、开拓进取、讲究信誉、注重质量、正当竞争、求贤若渴、虚怀若谷;在个人品德方面,应是自信、公正、豁达、真诚、严谨、民主等等。

5.4 营造有利于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成长的良好环境

5.4.1 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虽然温州在非公经济发展方面走在其他地方的前面,但政策环境同样不尽如人意,当务之急还是要彻底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在政策和政治上的歧视,保护非

公企业家的正当权益。具体来说，一要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要继续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使民营企业享有其他企业同等的投资机会。二要进一步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的投资决策地位，减少投资项目的审批，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完善咨询论证制度，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办事效率。要为民间投资营造一个平等、公平的投资环境，给予民间投资“国民待遇”。三要改变上市公司的评判体系，改变上市公司的认定方法，从以注重企业的所有制为主变为以企业真实实力为主，给有能力、有实力、有前景、能与国外企业竞争的私营企业上市的机会。四要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务环境。政府要切实转变职能，规范行政行为，强化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率。要从由政府配置资源向由市场配置资源转变，杜绝政府对企业的无理干预，让政府从适宜于私营经济的一切竞争性生产经营领域中彻底退出，把独立自主经营权归还给企业家，变直接干预为间接引导，给私营企业家应有地位，让他们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政府在管理社会的同时还有另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服务于社会。私营企业家希望政府重点提供的服务包括：为企业搭台、提供发展信息、科技创新、政策咨询等，这些都必须通过政策确定下来。

5.4.2 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中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这是我们党的代表大会首次倡导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对于充分调动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促进私营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04年的全国人大关于修宪的决议更是对私有财产权做了明确的规定，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权利有了法制保障。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制定相应的法规，保护私营企业家的成长。在体例上，应当做到充分体现宪法修正案所蕴含的公平观念，全面检讨现有的基本法律，修改其中不利于私营企业发展的条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私营企业的特别法。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现代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在这四种生产要素中企业家才能处于核心地位，能把其它三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生产力，是企业的灵魂。因此建立一部完善的企业家法不仅有利于保护我国企业家，而且有利于对私营企业家行为进行法制约束，促进私营企业家健康成长。

5.4.3 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私营企业主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某些不协调，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公

众认识上的偏差。由于长期忽视企业家和受权力经济以及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私营企业家劳动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尚未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和理解,社会上形成了一股贬低企业家的风气,人们总是将个人财富增长与权力腐败联系在一起,认为高收入者往往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这就使依靠自身人力资本富起来的企业家受到社会的歧视,造成私营企业家职业心理上的从众意识明显,对其应得的劳动报酬有较大的顾虑,企业家利益难以独立化,企业家也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企业家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难以成长。由于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时间短、发展快、规模大,令许多人难以适应,还有些人把产生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的原因归咎于私营企业主阶层,有的甚至存有“仇富心理”。而在“追求财富并不光彩”的评价导向下,多数企业主并未将经营企业作为一项事业去追求,而只是迫于生计或为满足物欲而奋斗。这些现象的存在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要消除这种偏见,一方面要在社会上大力加强私营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宣传一些遵纪守法、合法经营、为社会为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典型私营企业家的先进事迹,同时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财富观,理性对待贫富差距拉大现象,用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正确认识私营企业主阶层;另一方面,私营企业家要切实树立爱岗敬业、依法经营、尊重社会、多作贡献的经营思想,以自己的良好作风和实际业绩去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5.4.4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造就一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私营企业家队伍已势在必行。就当前而言,私营企业家的成长还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因为独立自主的企业家的成长需要独立自主的企业制度和竞争的市场体系,这是企业家正常成长的前提条件,没有完善的企业制度和竞争的市场体系,就不会有公平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造就一大批具有战略眼光和创新精神的私营企业家。而这些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他的“创新理论”中,把“创新”作为判断企业家的关键,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即创造和引进新的生产方法、新产品、企业组织新形式、开拓新资源、新市场等。当代经济学家又在熊彼特的基础上予以补充和发展,认为企业家的创新还包括:产品技术创新、目标市场创新和企业规模创新,也就是说,创新是企业家的素质,而企业家的创新素质,只有在激烈、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培养造就,而温州企业家尤其需要这样的市场环境来锻造他们的创新素质,因而,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成为了包括温州企业家在内的中国私营企业家健康成长的前提条件。

5.5 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对传统政府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批判。批判的焦点在于政府组织的低效率并不能有效满足公众的需求。即使对这一相对普遍的现实忽略不计，也应当承认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基于这两大前提，必然要求寻求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西方学者之所以提出非政府组织这个理念，主要是因为他们资源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灵，同时也看到了政府的失灵，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从市场和政府之外寻找到另外一种力量，以解决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因此，非政府组织是一种独立于国家、政府力量之外的非营利性群体组织，它包括慈善组织、志愿者组织、社会团体及“草根组织”等。¹⁶

本文所言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民间行业商会。行业商会，又称行业协会、同业商会、同业公会，它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个体工商业者及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依法、自愿组成的民间性、自律性、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现代行业商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与充分发挥作用，是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以温州为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民营经济突飞猛进发展，与此相适应，工商领域的行业商会应运而生，并逐步成长壮大，在温州经济发展中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4年上半年止，温州共有市本级行业商会（协会）114家，占温州市社团总数的1/3。这些行业商会（协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自发组建的，我们一般称之为行业商会，这一类基本上属于工商联主管，其典型代表是温州市服装商会；另一类是政府主管部门出面组建的，普遍叫做行业协会，其典型代表是温州市鞋革工业协会。

这些由民营企业家长们自发、自愿组建起来的商会和行业协会，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商会的领导人；依靠会员企业的会费、理事单位的自愿捐助和章程规定的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成为商会运作的资金来源，不花国家一分钱；为了保证组织决策的民主性、代表性，不断完善和健全商会的组织结构和治理机制；并且，在长期的市场活动中发展出了一套基于群体自愿遵守的制度规范和纠纷化解机制，使其成为行业规范和纠纷化解的重要一极。同时，他们组团参加国内外贸易展览会，宣传和提高温州产品的知名度，开拓国内外市场；组织开展本行业的质量认证、检验检测和技术培训，开展新产品维权；协调和沟通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温州烟具协会、眼镜商会还以行业代言人的身份走出国门，在欧盟、土耳其等地，主动应对国际贸易竞争，受到国人的尊重和世人的瞩目。

¹⁶ 中国非政府组织调查：另类和谐力量正在激活，《新华网》，半月谈记者李亚彪 傅不毅钟玉明，2005-06-06

行业商会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参政议政，发挥“桥梁、纽带”和参谋、助手作用。民间商会与会员企业联系紧密，能充分理解会员的难处，了解企业的需求，掌握行业发展的情况，具有参政议政的天然优势。温州民间商会参政议政的方式，一是直接参与政府的一些决策和工作，如在制定行业发展规划中充当政府部门的参谋和助手，提供有关资料，提出建议和意见，并在实施规划中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在日常工作中，民间商会还积极参与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以及市场秩序整顿。同时，积极向政府反映会员的意见、建议和呼声。在温州，商会和政府已经形成了工作上的良性互动。政府领导一直比较重视商会的意见，不仅及时帮助解决有关问题，还经常参加商会举办的一些重要活动，与商会共商行业发展大计。二是通过人大、政协、工商联等渠道，实现民营企业阶层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许多商会的领导人或民营企业家担任了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的领导，有很好的身份，有许多机会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能充分反映自己行业企业的心声。三是通过新闻舆论等渠道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要求。

另外，民间商会还积极发挥自我教育的作用，引导教育会员爱国、敬业、守法，积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社团党建工作，至今已在具备条件的22个商会建立了党组织。此举牢固确立了党对行业商会的政治领导，使商会的思想政治和自我教育工作有了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温州行业商会通过民主选举，使一批得到同行公认的优秀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脱颖而出，真正体现了先进性、群众性、代表性、权威性、全面性、公正性的要求。这批人通过商会实际工作和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锻炼，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进一步提高，而短周期的民主选举换届，又保证了这支队伍动态更新，永葆生机活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民间商会的地位将愈发凸显，发展前景将更加光明，它在加强行业自律、服务非公经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等方面的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因此，温州各级党委、政府和统战部门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发挥民间商会组织的独特作用，通过扶持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在相关行业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等方式，加强对其进行教育、引导和培养，不断提高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管理经济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从而使行业商会（协会）成为党委和政府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另一重要渠道。

第6章 结论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项新的探索性的工作。温州是全国非公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极其鲜明的群体特征，这些特征是：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怀有特殊的“感恩”心态；积极乐观、讲求奉献；具有强烈的参政意识；渴求并自觉践行诚信经营；自主意识强、敢为天下先、特别能创业；注重合作互助、善于“抱团”发展、务实而讲究效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还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队伍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显著增强；社会地位的变迁带来社会责任日益感日益增强等。

温州在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促进政治认同；以“光彩事业”载体强化社会责任；以行业协会纽带激发建设潜能；以政治待遇安排引导参政需求；以服务培训措施提升综合能力。但由于这项工作起步不久，全国范围内可供借鉴的经验还不多，因此还存在如下问题与不足：一是培养内容单一、重点不够突出；二是培养手段匮乏、方法过于简单；三是培养意识不足、力量难以整合；四是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学习意识不强，影响了培养的成效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快速成长。

针对当前温州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自身存在的素质缺陷以及培养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企业家成长的规律特点，笔者认为，改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要充分认识加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的重要意义；二要进一步明确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素质培养的主要内容，包括德行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等；三要建立健全推动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多种机制，包括领导协调机制、教育培训机制、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四要营造有利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成长的良好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舆论环境、市场环境；五要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尤其是民间行业商会的作用，使其成为培养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的另一重要渠道。只有全社会高度重视，党委政府加强领导，有关部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才能切实得到加强和改进，培养工作也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致谢

论文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导师周箴教授的精心指导,论文的选题、构思、修改、订稿,都倾注着恩师的心血。导师与我不断的沟通,提出了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建议,为我的论文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使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丝毫没有松懈,导师和蔼待人的风格深深感染了我,在此我深表感激!

其次我要向所有在硕士阶段教过我的老师表示感谢。这十多位老师都是我们学校我们学院具有高超学术水平的优秀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各个学科前沿的东西,丰富了我的知识结构。

同时在收集资料过程中温州市委统战部、工商联、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温州市发改委、经贸委、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等单位相关人士以及我的一些朋友也给予了特别支持和协助,我衷心地向他们表示感激之情。

论文中引用了一些其他人的成果,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请作者见谅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的丈夫,在多年的求学历程中,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学业,他给予了我莫大的精神动力与支持,使我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2006年3月

参考文献

中文参考文献

期刊杂志

- 【1】 朱豫鲁, 支持帮助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 中国统一战线, 2005/01
- 【2】 孙宝席,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践及思考, 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5/10
- 【3】 董明, 现阶段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若干思考,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01
- 【4】 杨启莲, 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03
- 【5】 刑建华, 民营企业住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 世纪桥, 2005/03
- 【6】 高贤峰, 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问题研究评述,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 2005/03
- 【7】 胡翔,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引导问题初探, 理论学习, 2004/08
- 【8】 吴波,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与发展趋势分析, 社会主义研究, 2004/04
- 【9】 陈建军、林亮, 关于温州发展模式形成的另一种解释,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3/08
- 【10】 戴海东, 从温州看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对社会的贡献,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01
- 【11】 王尚银, 温州经理人的调查与分析,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5/01
- 【12】 宁坚, 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评价体系的思考, 四川统一战线, 2004/22
- 【13】 陈建军、林亮, 温州民营企业群体生成路径分析, 温州论坛, 2003/01

著作

- 【1】 戴海东著, 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 【2】 严平著, 新视野,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9 年
- 【3】 傅桃生著,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4】 胡林辉著, 私营企业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5】 中共中央统战部等, 基层统战工作概论, 华文出版社, 2003 年
- 【6】 现代人力资源: 管理与组织行为, 关淑润主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 【7】 王乐夫编著, 领导学: 理论、实践与方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 【8】 赵忠令、胡月星等著, 现代领导心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 【9】 尹艳华, 成功领导者的素质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 【10】 丁栋虹, 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11】 史晋川,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 【12】 李丁富编著, 创造奇迹的——温州,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
- 【13】 袁亚平著, 世上温州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 年
- 【14】 胡宏伟、吴晓波著, 温州悬念,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15】 张连杰主编, 温州老板,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年
- 【16】 蒋云根, 政治人的心理世界, 学林出版社, 2002 年
- 【17】 桑玉成等著, 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 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

- 【18】 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等著,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会议论文

- 【1】 程炜,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几点认识, 与时俱进创伟业——浙江省经营管理研究会 2003 年年会论文汇集, 2003 年
- 【2】 徐跃华,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 广东省第四届高校统战理论研讨会论文, 2004 年
- 【3】 董晓璐, 加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思考, 广东省第四届高校统战理论研讨会论文, 2004 年

英文参考文献

著作

- 【1】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Mariland 1981
- 【2】 Donald E.Klingner John Nalbandian,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 Contexts and Strategie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 A. Ghosh and Z. Block, Audiences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in F. Hoy, T. G. Monroy, and J. Reichert, (eds.), *The Art and Sci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Vois.1 and 2, The 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erea, Ohio, 1993, pp.65-82.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个人简历:

1986 年 9 月-1990 年 7 月 原杭州大学外语系(现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读书,获文学士学位

1990 年 8 月-2003 年 1 月 温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先后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等职

(其中 1993 年 9 月-1994 年 8 月受单位指派赴日本进行为期 11 个月的水产技术研修)

2003 年 1 月-现在 瑞安市委统战部工作,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

2003 年 3 月-2006 年 3 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攻读在职 MPA

(其中 2004 年 8 月-2005 年 1 月受学校指派赴美国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学习进修)

已发表论文:

- 【1】 赵智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培养的重点方向,科技经济市场,2006 年,第 2 期,
P22-23

作者: 赵智展
学位授予单位: 同济大学

参考文献(37条)

1. 朱豫豪 支持帮助民营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期刊论文]-中国统一战线 2005(1)
2. 孙宝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开展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践及思考[期刊论文]-上海党史与党建 2005(10)
3. 董明 现阶段非公经济人士统战工作若干思考[期刊论文]-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1)
4. 杨启莲, 王金全, 陈世海 当前我国阶级阶层结构变化对统一战线的影响[期刊论文]-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5(3)
5. 邢建华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与对策思考[期刊论文]-世纪桥 2005(3)
6. 高贤峰 我国私营企业主参政问题研究评述[期刊论文]-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3)
7. 中共山东省工商联党组 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状况和政治引导问题初探[期刊论文]-理论学习 2004(8)
8. 吴波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与发展趋势分析[期刊论文]-社会主义研究 2004(4)
9. 陈建军, 林亮 关于温州发展模式形成的另一种解释——从温州民营企业群体成长路径角度的分析[期刊论文]-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3(8)
10. 戴海东, 谢建芬 从温州看我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对社会的贡献[期刊论文]-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11. 王尚银 温州经理人的调查与分析[期刊论文]-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12. 宁坚 当前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评价体系的思考 2004(z2)
13. 陈建军, 林亮 温州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生成路径分析 2003(01)
14. 戴海东 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研究 2005
15. 严平 新视野 1999
16. 傅桃生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 2003
17. 胡林辉 私营企业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2002
18. 中共中央统战部 基层统战工作概论 2003
19. 关淑润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 2001
20. 王乐夫 领导学:理论、实践与方法 2004
21. 赵忠令, 胡月星 现代领导心理 2003
22. 尹艳华 成功领导者的素质研究 2000
23. 丁栋虹 制度变迁中企业家成长模式研究 1999
24. 史晋川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 2002
25. 李丁富 创造奇迹的一温州 2004
26. 袁亚平 世上温州人 2003
27. 胡宏伟, 吴晓波 温州悬念 2002
28. 张连杰 温州老板 1999
29. 蒋云根 政治人的心理世界 2002
30. 桑玉成 政府角色——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与不作为的探讨 2000

31. [郁建兴, 黄红华, 方立明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以温州商会为研究对象](#) 2004
32. [程炜 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工作的几点认识与时俱进创伟业](#) 2003
33. [徐跃华 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 2004
34. [董晓璐 加强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思考](#) 2004
35.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1981
36. [Donald E Klingner, John Nalbandian Public Personnel Management:Contexts and Strategies](#) 2001
37. [A Ghosh, Z Block Audiences for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199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014126.aspx

授权使用: 温州大学图书馆(wzdxstg), 授权号: 8dc8727e-4852-43e9-81a9-9d9f009cb9d4, 下载时间: 2010年6月
24日